

《東華漢學》第 23 期；63-100 頁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華文文學系
2016 年 6 月

袁曄《獻帝春秋》之歷史敘述評議*

陳俊偉**

摘要

吳人袁曄撰有《獻帝春秋》一書，雖然《隋書·經籍志》將其列入「古史」類，實則內容謬誤甚眾，從裴松之開始即頗多學者指責之。然而，看似率爾而作、遠離真實性之嚴苛要求的現象背後，其臨史心態十分值得後世讀者玩味：或過度好異求奇，抑或有意、無意間隱伏政治立場。多條史料本身相當具備文學性，大量運用對話等各種史傳寫人之技巧；尤其是屢屢將角色置諸於急迫的情境下交代其反應，藉此書寫之人物往往較容易表現性格側面。另外，該書還對敵國實際開國君王曹操較不友善，竟然還對曹操之重要敵手袁紹予以較正面的型塑，成為魏晉史籍中少數的異類；這不僅折射了三國鼎峙爭霸的實況對史籍的影響，同時說明了即使是看似此類因「愍其廢絕」而「以備遺亡」的著作，皆難

* 承蒙兩位審查委員的細心審閱，惠賜甚多寶貴意見；關於《獻帝春秋》的補闕價值、史家筆法等問題似亦有繼續發揮的空間，容或他文再行處理。投稿之前，王文進老師、林盈翔學長提出不少建言，張蓓蓓老師提起雜史雜傳值得探討，洪敘銘賢兄協助商榷編輯之事宜，在此一併謹致謝忱。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免囿於見聞立場而自成一套非常迥異於他人的論述。藉此也不難明白，《獻帝春秋》信然有其獨到的文史價值存焉。

關鍵詞：漢末群雄、人物書寫、史傳文學、雜史雜傳、袁曄《獻帝春秋》

一、前言

魏晉時期之三國史相關著作，目前大多已經散佚。幸而劉宋（420-479）史家裴松之（370-449）奉詔編纂之《三國志注》（《裴注》），徵引的書籍超過二百一十種，包括史著約一百五十種以上。諸多史籍有賴於裴松之較「首尾完具」地保存，後世方才有足夠的材料還原部份史籍之原貌與概況。袁曄／曄《（漢）獻帝春秋》¹總共徵引約29次，數量為《裴注》引用史籍排行榜約第十四位²。可見該書於當代、後世或有其相當的影響力。雖然數量稱不上豐富，也不算稀少；再配合其他著作，例如李賢（654-684）《後漢書注》（《李賢注》）還有33條³整體相對簡略的佚文留存，其中包括著未與《裴注》重疊者。如此，足資後代學者以專書為對象進行研究。

按其書名推測，《獻帝春秋》主要收集東漢（25-220）獻帝劉協（181-234，189-220在位）時期的史料；且基於史家追溯歷史事件起源的慣例，應當有一些較早時期的相關記載。漢獻帝一朝結束的時間點是曹魏（220-265）魏文帝曹丕（187-226，220-226在位）代漢，若考量到「黃巾之亂（黃巾大起義）」（184）、抑或「董卓之亂」（190）是一個標誌性的起始點、王朝命運的轉捩點，則獻帝時期無疑是屬於、甚至幾盡等同於東漢時期與廣義三國時期（所謂廣義，即包含「前（朝代）

¹ 盧弼（1876-1967）注引沈家本（1840-1913）曰：「《隋志》，《獻帝春秋》十卷，袁曄撰。《唐志》同，惟獻上多一漢字。《吳志》〈陸瑁傳〉廣陵袁迪注：迪孫曄，字思光，作《獻帝春秋》，與隋唐二志合。《續漢志》注、《後漢書》注、《文選》注、《御覽》諸書，並作袁曄，然裴氏他卷屢稱袁曄，疑不能明也。」盧弼集解，錢劍夫整理，《三國志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6），頁52。

² 數據係參酌林盈翔的統計再自行排名，見氏，《裴松之與劉孝標史注學比較研究》（花蓮：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0），頁136。

³ 凡論及《李賢注》的徵引數量者，皆為自行統計。

三國時期」、「朝代三國時期」⁴)的重疊地帶。政權分裂的歷史階段，實可預測箇中蘊含著值得探討的內容。又，作者的著述時間點屬於雜史雜傳小說化傾向明顯的魏晉時期：凡此，當有其文史價值存焉。

將《獻帝春秋》之歷史敘述置諸於三國史著作、東漢史著作的網絡之中。探討其內容之相對座標、史料價值以及史家執筆的著述傾向，並揭示該書的臨史心態、說明人物書寫之精采處。藉此順勢理清了該書與其他相關史籍的異同關係，乃甚至於傳承關係，從而也深化了對魏晉史籍、《裴注》等的認識。

二、袁曄《獻帝春秋》於《隋志》之分類與著述性質

作者袁曄的生平資料甚少，姚振宗（1842-1906）曰：「曄祖迪與張紘過江，其時當在獻帝初年；下至吳亡，凡九十餘年。曄生長于吳，故所作多傳聞異詞，其人或未嘗入晉。」⁵推測袁曄係屬孫吳（229-280）人士，因而著作頗多「傳聞異詞」，其人生平可能未嘗歷經亡國、入晉的時間點。追溯姚氏推論的根據，應是從目前僅存的線索，即《三國志·吳書·虞陸張駱陸吾朱傳》（後文簡稱《吳志》，「魏書」、「蜀書」部份按此例）注引裴松之曰：「迪孫曄，字思光，作《獻帝春秋》，云迪與張紘等俱過江，迪父綏為太傅掾，張超之討董卓，以綏領廣陵

⁴ 有別於「朝代三國」（220-280），通常學者往往或上溯至「黃巾之亂」、或上溯至「董卓之亂」。陳壽亦大致從「黃巾之亂」開始建構歷史，崔曙庭曰：「三國時期，如果從魏國建立算起，到吳國的滅亡，恰好整整六十年（二二〇～二八〇）。撰寫三國時期的歷史，要是嚴格按朝代起訖為準，那就只能寫這六十年的史事。然而陳壽在編撰《三國志》時，卻不是嚴格以王朝的興亡的年代為標準的。作者考慮到三國的形勢，由來已久，實際上是從漢靈帝中平元年（一八四）黃巾大起義開始的。」見氏，〈三國志評介〉，收錄於倉修良主編，《中國史學名著評介（第一卷）》（臺北：里仁書局，1994），頁234。今人從「董卓之亂」算起之代表作，可詳見于濤，《三國前傳：漢末群雄天子夢》（北京：中華書局，2006）。

⁵ 清·姚振宗撰，《三國藝文志》，二十五史刊行委員會編，《二十五史補編》（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59），第3冊，頁3222。

事。」⁶（頁1337）袁曄的曾祖袁綏大抵為漢末人，曾先後任太傅掾、廣陵事，曾參與起兵討董卓（?-192）。至於其祖父袁迪，則與日後的孫吳名臣張紘（153?-212?）一併過江（189），應該是為了躲避「董卓之亂」這一巨變衍生的戰爭、動亂⁷。按此，袁曄很可能隨著祖父一同過江、抑或於孫氏統治下出生。姚氏的推測也不是沒有破綻，畢竟袁曄之祖父來到孫吳領地，不代表袁曄本人、或者其父親皆一同南渡。只是沒有其他資料的情況下，過度質疑反倒顯得苛刻。

魏晉時期專載漢獻帝一朝，並以帝王劉協之各式稱號命名的史著。除袁曄《獻帝春秋》，還有晉人⁸樂資《山陽公載記》（《裴注》徵引約11次，《李賢注》徵引約14次），該書誠如馬鐵浩所云：「是書記事下限在建安十九年，則雖名《山陽公載記》，所記者蓋皆漢獻帝遜位前之事。」⁹另外，更早期的成果則可見漢末近侍之臣¹⁰撰寫的《獻帝起居注》（《裴注》徵引約13次，《李賢注》徵引約23次），漢末史家、亦是王族成員的劉艾《獻帝傳（紀）》¹¹（《裴注》徵引約27次¹²，書名「獻帝

⁶ 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2007）。本文凡徵引該書皆僅附頁數，不另作註腳；又，為有利於讀者進入歷史情境，凡採取正史之注文者，視情況或先行交代一段原書對應的正文。

⁷ 《吳志·張嚴程闕薛傳》：「張紘字子綱，廣陵人。游學京都，還本郡，舉茂才，公府辟，皆不就，避難江東。」（頁1243）所謂「公府辟，皆不就」，注引孫吳官方史籍韋昭（204-273）《吳書》：「大將軍何進、太尉朱儁、司空荀爽三府辟為掾，皆稱疾不就。」（頁1243）這裡所避之「難」應當是指「董卓之亂」，從而可藉張紘之生平推論出袁迪南渡的時間點。

⁸ 《史通·內篇·六家》：「晉著作郎魯國樂資。」唐·劉知幾著，清·浦起龍通釋，王煦華整理，《史通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頁10。

⁹ 見氏，《《史通》引書考》（北京：學苑出版社，2011），頁260。

¹⁰ 《隋書·經籍志》「起居注類」：「今之存者有漢獻帝及晉代已來《起居注》，皆近侍之臣所錄。」唐·魏徵等撰，《隋書》（臺北：鼎文書局，1980），頁966。

¹¹ 盧弼注引章宗源（1752-1800）曰：「愚按《漢志》有〈高祖傳〉、〈孝文傳〉，艾既為獻作紀，又更為傳，其名蓋仿於此。」沈家本曰：「據此，則《獻帝傳》即《獻帝紀》，非二書也。」盧弼集解，錢劍夫整理，《三國志集解》，頁198。既然出自同位史家，無論是否為同一書，信然不妨礙一併論之。

紀」者15次、「獻帝傳」者12次；《李賢注》徵引約15次，書名「獻帝紀」者11次、「獻帝傳」者4次）等等。除可見及漢獻帝一朝的歷史相當受到世人的關注，袁曄、樂資等或許也有受到《獻帝起居注》、《獻帝傳（紀）》問世的啟發。

《獻帝春秋》一書的命名明顯有致敬《春秋》之義，《隋書·經籍志》或也因而將該書列入「古史」類¹³，與之東晉（317-420）習鑿齒（?-384?）《漢晉春秋》、孫盛（307-378）《魏氏春秋》等，以編年體正史的規格撰寫而成之名著同列。〈經籍志〉釋義的兩段論述，基本可以看出該類史著理想的特色：

自史官放絕，作者相承，皆以班、馬為準。起漢獻帝，雅好典籍，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命潁川荀悅作《春秋左傳》之體，為《漢紀》三十篇。言約而事詳，辯論多美，大行於世。……其（汲冢）著書皆編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經》。諸所記事，多與《春秋》、《左氏》扶同。學者因之，以為《春秋》則古史記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體。今依其世代，編而敘之，以見作者之別，謂之古史。¹⁴

除論及建安五年（200）撰成的《漢紀》，「汲冢書」約於西晉太康元年（280）出土，先後掀起風氣。後半部份強調這類「古史」乃是仿效《春秋》之體，前半部份強調《漢紀》「約而事詳」、「辯論多美」的優點，也大抵說出了「古史」類理想的標準、典範。

《隋志》的分類自有其考量，《獻帝春秋》既然以「春秋」為書名，列入「古史」類亦無不可，後世如《舊唐書》、《新唐書》皆是列入義近「古史類」的「編年類」¹⁵。只不過，按照《隋志》自己闡明的分類

¹² 其中在曹魏代漢一事上，同一次徵引內即徵引多條、多篇公文，唯內容上大致皆與易代相關而彼此互通。就引用質性而言，實與只引用一次無太大差異，便以1條計算之。另，林盈翔漏計本書，此一數量為筆者自行統計。

¹³ 唐·魏徵等撰，《隋書》，頁957。

¹⁴ 同前註，頁959。

¹⁵ 《舊唐書·經籍志》：「《漢獻帝春秋》十卷袁曄撰。」後晉·劉昫等撰，

原則，置諸「雜史類」或許也是一個適宜的作法。以下徵引《隋書·經籍志》「雜史類」序文，約分為四段¹⁶，先是交代魏晉之前的起源：

自秦撥去古文，篇籍遺散。漢初，得《戰國策》，蓋戰國遊士記其策謀。其後陸賈作《楚漢春秋》，以述誅鋤秦、項之事。又有《越絕》，相承以為子貢所作。後漢趙曄，又為《吳越春秋》。其屬辭比事，皆不與《春秋》、《史記》、《漢書》相似，蓋率爾而作，非史策之正也。¹⁷

再交代魏晉時期大致的兩種狀況：

靈、獻之世，天下大亂，史官失其常守。博達之士，愍其廢絕，各記聞見，以備遺亡。是後群才景慕，作者甚眾。¹⁸

又自後漢已來，學者多鈔撮舊史，自為一書，或起自人皇，或斷之近代，亦各其志，而體制不經。又有委巷之說，迂怪妄誕，真虛莫測，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¹⁹

最後則是總結：

通人君子，必博采廣覽，以酌其要，故備而存之，謂之雜史。²⁰

「雜史類」追溯到《楚漢春秋》，以及《越絕書》、《吳越春秋》。尤其《吳越春秋》之內容「率爾而作」、「非史策之正」，與《史》、《漢》等正史有別。《隋志》說明了「雜史類」從早期作品開始就有「率爾而作」的問題，接續則概述魏晉時期的史籍著述概況。指出「靈、獻之世，

《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頁 1991；《新唐書·藝文志》：「袁曄《漢獻帝春秋》十卷」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頁 1459。

¹⁶ 分段乃參考逢耀東的解讀方式，見氏，〈《隋書·經籍志·史部》及其「雜傳類」的分析〉，《魏晉史學的思想與社會基礎》（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0），頁 76-77。不過，即使魏晉時期「雜史類」可行細部分類，在皆屬於同一大類型的情況下，《隋志》對彼此的描述理論上應當也觸及了共同的著述性質。

¹⁷ 唐·魏徵等撰，《隋書》，頁 962。

¹⁸ 同前註。

¹⁹ 同前註。

²⁰ 同前註。

天下大亂，史官失其常守」的時局轉折，並言「博達之士，愍其廢絕，各記聞見，以備遺亡」的「史不可亡」²¹心態，之後則「群才景慕，作者甚眾」，開始有諸多作者著手紀錄歷史。若以專注漢獻帝一朝、並以劉協之各種稱號書名者為例，另外幾本著作，除《獻帝起居注》自有其特殊的「起居類」之歸屬，《山陽公載記》、《獻帝傳（紀）》於《隋志》皆歸類在「雜史類」²²。劉艾就是馨烈所扇者，樂資等人則應屬「是後群才景慕」之人，袁曄該書應也適宜置諸此處。除了這一小類型，魏晉時期「雜史類」還有一種類似後代「史鈔」的小類型²³，即學者往往「鈔撮舊史」、「自為一書」，卻又「亦各其志」而「體制不經」；這一小類型往往有「委巷之說」，雖涉及國家大事，實則「迂怪妄誕」、「真虛莫測」。最後，按照《隋志》總結的語氣，對這包含兩小類的「雜史類」顯然評價不高。

《隋志》結尾處言之僅具「備而存之」的價值，其實也暗示了這類著作記載之史料本身可能雜錯謬誤，《獻帝春秋》同樣也時常有真實性方面的問題。裴松之即屢屢責之，侯康（1798-1837）嘗云：「裴注作袁曄，所引凡二十餘條，深不滿其書。……〈荀彧傳〉注斥其虛罔；〈張紘傳〉注譏其虛錯；皆毀詆之辭。」²⁴所謂「深不滿其書」，正是《裴注》對該書的態度。裴松之曾以相當不滿的語氣曰：「袁曄、樂資等諸所記載，穢雜虛謬，若此之類，殆不可勝言也。」（頁947）侯康所云的「毀詆之辭」

²¹ 雷家驥：「國可亡而史不可亡，這是中國傳統史家的共識。」見氏，《中古史學觀念史》（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0），頁432。除前引諸書，舊題王粲（177-217）《英雄記》也屬於這類作品，詳見魏·王粲撰，清·黃奭輯，《英雄記》，收錄於俞紹初輯校，《建安七子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

²² 《隋書·經籍志》「雜史類」：「《漢靈獻二帝紀》三卷漢侍中劉芳撰，殘缺。梁有六卷。」「《山陽公載記十卷》樂資撰。」唐·魏徵等撰，《隋書》，頁960。

²³ 遼耀東，〈《隋書·經籍志·史部》及其「雜傳類」的分析〉，頁77。

²⁴ 清·侯康撰，《補三國藝文志》，二十五史刊行委員會編，《二十五史補編》，第3冊，頁3175-3176。

正是其對該書內容之特色的一個歸納，也跟姚振宗所云「多傳聞異詞」的判斷相呼應，涉及了包括歷史敘述之真實性與文學性的議題。

這裡列舉《獻帝春秋》一個與他書不同，而遭到裴松之指責的案例稍事說明。劉備（161-223）勸孫權（182-252）置都秣陵一事，詳見《吳志·張嚴程闞薛傳》：「（張）紘建計宜出都秣陵，權從之。」（頁1245）注引西晉虞溥撰寫的地方志²⁵《江表傳》：

紘謂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為金陵。地勢岡阜連石頭，訪問故老，云昔秦始皇東巡會稽經此縣，望氣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故掘斷連岡，改名秣陵。今處所具存，地有其氣，天之所命，宜為都邑。」權善其議，未能從也。後劉備之東，宿於秣陵，周觀地形，亦勸權都之。權曰：「智者意同。」遂都焉。（頁1246）

注引《獻帝春秋》：

劉備至京，謂孫權曰：「吳去此數百里，即有警急，赴救為難，將軍無意屯京乎？」權曰：「秣陵有小江百餘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軍，當移據之。」備曰：「蕪湖近濡須，亦佳也。」權曰：「吾欲圖徐州，宜近下也。」（頁1246）

嚴格說來，陳壽、虞溥、袁曄三人記載的內容皆有所差異，唯獨陳、虞二人的記載尚且不至於過份衝突，袁曄的說法卻與其他兩位史家擊難。裴松之曰：

臣松之以為秣陵之與蕪湖，道里所校無幾，於北侵利便，亦有何異？而云欲闚徐州，貪秣陵近下，非其理也。諸書皆云劉備勸都秣陵，而此獨云權自欲都之，又為虛錯。（頁1246）

陳壽是記載孫權接受了張紘的意見，虞溥則是記載孫權雖然認同了張紘的意見，卻要等到劉備也同樣勸都秣陵後才因「智者意同」而執行此議。

²⁵ 王文進指出：「雖由晉吏虞溥所編，藉以蒐集當地民情，故表面上看似由北方立場來定位南方江表偏夷之視野，實際上其內容卻保存著江東地區人士話語之原貌。」見氏，〈論「赤壁意象」的形成與流轉——「國事」、「史事」、「心事」、「故事」的四重奏〉，《成大中文學報》第28期（2010.4），頁97。

裴松之「諸書皆云」一語暗示了應有三書以上言及此事，筆者查閱今存曾仕宦孫吳政權的西晉吳人張勃²⁶《吳錄》亦有此事²⁷，可明《裴注》非妄言。《江表傳》的內容較《三國志》多了些曲折，但皆是孫權接受他人建議，僅有《獻帝春秋》是「自欲都之」。至於裴松之所云「貪秣陵近下，非其理也」的說法則未必，盧弼注引錢大昕（1728-1804）曰：「秣陵與廣陵隔江相對，而廣陵屬徐州部。權意欲都秣陵以圖廣陵，故云欲圖徐州。裴氏譏之，殆未審於地理矣。」²⁸縱使兩地距離不遠，理應擇其較近者，錢氏之說法應是。即使如此，《獻帝春秋》寫孫權「自欲都之」的說法，亦不禁讓人懷疑起袁曄之言是否屬實，抑或只是好異求奇的臨史心態導致其收錄傳聞？

檢視《獻帝春秋》的內容，還有其他學者對該書整體、部份內容的批評，若將該書也視為一部可供正史採擇的雜史作品，應當沒有問題。其他《裴注》批判力道更嚴厲的案例，後文即續論之。

三、真實性與文學性探析

清代四庫館臣曾指出《裴注》的優點：「網羅繁富，凡六朝舊籍，今所不傳者，尚一一見其崖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酈道元《水經注》，

²⁶ 《史記·伍子胥列傳》司馬貞【索隱】：「按：張勃，晉人，吳鴻臚嚴之子也，作《吳錄》，裴氏注引之是也。」西漢·司馬遷撰，劉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6），頁2173-2174。據此，張勃應為孫吳張儼（?-266）之子。《吳錄》脫稿時間點應同《江表傳》一樣於《三國志》後，《吳志·妃嬪傳》注引《吳錄》：「（孫）亮妻惠解有容色，居候官，吳平乃歸，永寧中卒。」（頁1200）直至永寧（301-302）以後。

²⁷ 《吳錄》：「張紘言於孫權曰：『……』劉備勸都之，自京口遷都焉。」輯佚詳見日·松本幸男，〈續張勃吳錄考（附吳錄紀傳）〉，《學林》第16期（1991），頁71。

²⁸ 盧弼集解，錢劍夫整理，《三國志集解》，頁3227。

李善《文選注》皆翦裁割裂之文。」²⁹正因為「首尾完具」、非「翦裁割裂」，其徵引之史料的前後敘事發展往往較形完整，從這一點意義上可以說《裴注》容易具備文學性。今人董廣偉曰：「辭采也是裴松之比較注意的一個選擇標準。……這些書於史實記載良莠不齊，但較注重文學色彩。」³⁰又，今人李伯勛曰：「裴注不朽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其所引史傳具有一定的文學性。」³¹兩位學者之說誠然。

《獻帝春秋》既為《裴注》以一定數量徵引者，其間文學性之探討頗值得期待。尤其魏晉時期雜史雜傳³²之文學色彩明顯，不僅較關注人物性格、敘事也較具情節性³³，相信也會在該書身上體現。宋志英曾指出《山陽公載記》、《獻帝春秋》的編纂特色：

記事較詳細，尤其是人物對話，多為《三國志》和《後漢書》所不載。這些人物語言，有的確可反映出人物的性格特點，但缺點是多數略具流俗俚俗之感，或者所記虛妄不已，甚或厚誣古人。³⁴

宋氏論述中指出的幾點情況，確實符合《獻帝春秋》一書的諸多史料之內容。缺點暫且不提，文學技巧例如「記事較詳細，尤其是人物對話」

²⁹ 清·紀昀等纂，《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第2冊，頁973。

³⁰ 見氏，〈從文史分野淺議裴松之《三國志注》〉，《洛陽理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3卷第2期（2008.10），頁3。

³¹ 見氏，〈審視《三國志》裴注引書的史傳文學價值〉，《黃河科技大學學報》第2卷第2期（2000.6），頁83。

³² 雜史、雜傳兩者之間特徵相似，稍有區別處在於雜史較重乎事、雜傳較重乎人，熊明：「其中尤以雜傳、雜史最難區分，這主要是由於二者具有相似的特徵……雜史偏重對事實的記錄，而雜傳偏重對人物的傳寫。」唯獨寫事、寫人往往交疊，因而可視為類似的存在。見氏，《漢魏六朝雜傳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4），33-34。

³³ 熊明：「漢魏六朝雜傳的普遍小說化傾向，具體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人物傳寫方面，由正統史傳對人物的歷史化定位、對政治資鑒和道德勸誡意義的重視轉向對人物性格的關注和表現，人物傳寫傾向生活化、個性化；在敘事建構方面，擺脫了正統史傳僅僅對史事的陳述，敘事建構表現出一定的形象性、故事性和情節性，並注重虛構中的真實感。」同前註，頁13。

³⁴ 見氏，《晉代史學研究》（南開大學史學理論及史學史博士學位論文，2002.6），頁114。

這點，前文論及孫權遷都一事時已有徵引史料，較諸行文簡略的《三國志》來說更是明顯。

運用人物對話、人物語言以使得史傳頗具文學色彩，本就屬於史傳寫人技巧之一³⁵。而且，對話必涉及到兩人以上的互動、對比，互動、對比之中可以見及彼此面貌；又，若兼之以彼此立場有別，則更容易讓角色們處在一種衝突與矛盾的狀態中，使得敘事充滿張力。史家書寫人物時，往往使用多種技巧以利於歷史人物活靈活現，此不必贅論；尤其是較諸板重莊正、簡略嚴肅的正史來說，雜史雜傳之作的行筆更形自由。在檢視現存《獻帝春秋》留存之史料後，除了以對話為首的諸種寫作技巧，**袁曄其實還尤擅、尤愛於一些將角色置諸於危急、短時間內需做出選擇的情境之史料，藉其面對難題時之反應以表現人物的性格側面，型塑出人物各自的面貌。**大致屬於現今敘事理論中的「展示」、「呈現」之方式，角色可以透過言行展示、或者在與其他角色互動間呈現自己。接續即列舉諸例：

（一）荀彧與曹操關係之破裂過程的記載

前文宋氏指出的「厚誣古人」，可詳見袁曄對荀彧（163-212）持兩端、反對曹操（155-220）封魏公及其過世等事的歷史敘述。牽涉了曹氏篡漢的進程，各家的說法都有所不一。《魏志·荀彧荀攸賈詡傳》：

十七年，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密以諮彧。彧以為太祖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會征孫權，表請彧勞軍于譙，因輒留彧，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

³⁵ 史傳的寫人藝術技巧很多，例如張新科列舉曰：「史傳文學為了寫出個性化的人物，都特別注意選擇典型事件，緊扣人物的身份、經歷和遭遇，用人物自己的語言、行動來體現其個性。有時為了突出個性，還採用對比描寫、細節描寫、心理描寫等方法。」見氏，《唐前史傳文學研究》（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00），頁219-220。

太祖軍至濡須，彧疾留壽春，以憂薨，時年五十。諡曰敬侯。明年，太祖遂為魏公矣。（頁317）

荀彧並不支持董昭的提議，且強調應當「愛人以德」，讓曹操恪守臣節、保持匡扶東漢王朝的初衷。結果卻是曹操「心不能平」，致使荀彧「以憂薨」。文末處，史家還用一「遂」字道出了荀彧之死與曹操封魏公的因果關係；顯然，陳壽認為荀彧實是擋在曹氏試圖自封魏公的路上，一顆礙眼的石頭。荀彧強調曹操興兵是為了「匡朝寧國」，也交代其效力曹氏的初衷，與之尚有維護東漢王朝的心理。

荀彧助曹創業，不免遭來後世非議³⁶。然而，通達之論者基本認同荀彧具有被視為漢臣的資格、抱持著扶漢之心，如此的判斷多與其末年異議相關³⁷。同傳注引《魏氏春秋》對荀彧之死有更詳細的記載：「太祖饋彧食，發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咸熙二年，贈彧太尉。」（頁317）死因乃是曹操的暗示，死法則是「飲藥而卒」。至於同傳注引的《獻帝春秋》³⁸雖不否認荀彧異議，卻型塑出不同的臉譜：

董承之誅，伏后與父完書，言司空殺董承，帝方為報怨。完得書以示彧，彧惡之，久隱而不言。完以示妻弟樊普，普封以呈太祖，太祖陰為之備。彧後恐事覺，欲自發之，因求使至鄴，勸太祖以女配帝。太祖曰：「今朝廷有伏后，吾女何得以配上，吾以微功

³⁶ 例如東晉袁宏（328-376）：「一污猶有慚色，而況為之謀主！功自己為之而已死之，殺身猶有餘愧，焉足以成名也。」晉·袁宏撰，李興和點校，《袁宏《後漢紀》集校》（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2008），頁382。

³⁷ 李澄宇（1882-1955）：「操必死彧而後受九錫、稱魏公，彧亦無愧漢臣哉！」李澄宇撰，《讀二十五史蠡述·讀三國志蠡述》（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3），第1冊，頁375；王永平：「范曄、司馬光等通達的史家則對荀彧稱賞有加，肯定其歷史業績，與今天的歷史主義態度多有切合處。荀彧一生高自標榜，言為士則，行為世範，一以貫之，『乃心王室』，這是他助曹平天下的原始動機，也是鑄就他人人生悲劇的癥結所在。」見氏，〈論荀彧——兼論曹操與東漢大族的關係〉，《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3期（1997），頁61。

³⁸ 李賢於《後漢書·鄭孔荀列傳》亦有注引本條《獻帝春秋》的記載，內容則多有刪減。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頁2291；以下引用本書，亦僅附頁數。

見錄，位為宰相，豈復賴女寵乎！」或曰：「伏后無子，性又凶邪，往常與父書，言辭醜惡，可因此廢也。」太祖曰：「卿昔何不道之？」或陽驚曰：「昔已嘗為公言也。」太祖曰：「此豈小事而吾忘之！」或又驚曰：「誠未語公邪！昔公在官渡與袁紹相持，恐增內顧之念，故不言爾。」太祖曰：「官渡事後何以不言？」或無對，謝闕而已。太祖以此恨或，而外含容之，故世莫得知。至董昭建立魏公之議，或意不同，欲言之於太祖。及齋璽書犒軍，飲饗禮畢，或留請閒。太祖知或欲言封事，揖而遣之，或遂不得言。或卒於壽春，壽春亡者告孫權，言太祖使或殺伏后，或不從，故自殺。權以露布於蜀，劉備聞之，曰：「老賊不死，禍亂未已。」（頁318）

袁曄指出「太祖以此恨或，而外含容之」，蓋認定荀彧或隱藏伏后之書信是遭到曹操忌恨的理由；至於自言「世莫得知」一語，也不知道史家又是從何管道曉得該事，抑或想藉此傳聞異詞以聳人視聽。另外，董昭建封魏公之議，《獻帝春秋》另有記載其書與荀彧的一封信³⁹；除顯見史家對該事的重視，若配合著荀彧異議一事一同閱讀，抑或有彰顯曹操不臣之心的用意。

回顧該條史料，主要是藉荀彧、曹操兩人的對話構成，兩者之中又偏以荀彧為主角。面對伏皇后（?-214）之父親伏完（?-209）試圖示信攏絡的舉動，荀彧沒有流露其扶漢之心。接下來，反倒一面「惡之」、另一面又似乎有所顧忌而不願跟曹操告密，表現出人物面對燙手山芋時猶豫不決、持兩端的心理狀態。等到其聽聞相關的風聲之後，眼看伏完試圖替董承（?-200）復仇之事就要被揭露，方才因為自保的動機而前往跟曹操告密。結果，曹操不但不領情，反倒連續兩次戳破心曲，一次「陽驚曰」、一次「又驚曰」的反應與話語內容，寫出了荀彧拙於應對、虛

³⁹ 《魏志·程郭董劉蔣劉傳》注引《獻帝春秋》：「昭與列侯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書與荀彧曰：『……今曹公遭海內傾覆，宗廟焚滅，躬擐甲冑，周旋征伐，櫛風沐雨，且三十年，芟夷羣凶，為百姓除害，使漢室復存，劉氏奉祀。……今徒與列將功臣，並侯一縣，此豈天下所望哉！』」（頁440）

偽畏死的姿態。接下來關於建封魏公一事上，「彧意不同，欲言之於太祖」的說法還是類同《三國志》等書，突顯了荀彧試圖阻止曹操擴大權力、抬高地位的企圖；尤其「壽春亡者告孫權，言太祖使彧殺伏后，彧不從，故自殺」的說法，亦指明了荀彧乃是遭曹操間接逼死。但是袁曄筆下的荀彧，猶疑不決、笨拙、虛假，很難讓人相信他就是有「王佐才」、被視為曹魏政權之「子房」的荀彧⁴⁰。趙一清（1711-1764）曰：「姜云：若依此書，苟令君全無主持，何為謀士？恐史傳之譌。」⁴¹此說誠然。

袁宏基本採用陳壽的說法⁴²，范曄（398-445）於《後漢書·鄭孔荀列傳》（頁2290）的說法亦近似《三國志》而在結尾處採用了《魏氏春秋》的記載，史家們整體呈現荀彧較正面的形象，僅僅袁曄收錄了一條頗具詆毀效果的史料，也難怪裴松之發出感慨：

臣松之案《獻帝春秋》云彧欲發伏后事而求使至鄴，而方誣太祖云「昔已嘗言」。言既無徵，迴託以官渡之虞，俛仰之間，辭情頓屈，雖在庸人，猶不至此，何以玷累賢哲哉！凡諸云云，皆出自鄙俚，可謂以吾儕之言而厚誣君子者矣。袁曄虛罔之類，此最為甚也。（頁319）

荀彧若有如此「辭情頓屈」的表現實在是讓人難以想像，這條史料或許是「出自鄙俚」。這樣「玷累賢哲」、「厚誣君子」，不僅違逆《春秋》之義「為賢者諱」，亦是《獻帝春秋》中「虛罔之類」的一個顯例。

（二）審配城破被擄的記載

從前文的論述，已經可以察見《獻帝春秋》之記載有「厚誣古人」的問題。暫且撇除這些指責。袁曄確實也運用了頗多寫人的藝術技巧，

⁴⁰ 《魏志·荀彧荀攸賈詡傳》：「彧年少時，南陽何顛異之，曰：『王佐才也。』」（頁307）、「初平二年，彧去紹從太祖。太祖大悅曰：『吾之子房也。』」（頁308）

⁴¹ 清·趙一清撰，《三國志注補》，清·趙一清等撰，《三國志注補：外四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5），頁132。

⁴² 晉·袁宏撰，李興和點校，《袁宏《後漢紀》集校》，頁381。

例如藉言語、對話、互動以型塑人物，讓角色置身矛盾、衝突中以進行書寫，而使過程更具備張力；史料之故事情節方面也稍有鋪陳與轉折，頗具小說化色彩。《獻帝春秋》之文學性的魅力不僅如此，該書往往將角色置諸於一個較急迫、或者需要於短時間內做出判斷、選擇、回應的環境中，藉此書寫人物。袁曄對審配（?-204）面臨城破一事的反應之記載，目前僅留下裴松之轉述的簡略內容、沒有出現兩人以上對話的相關敘述，唯獨故事梗概亦不難發現該書的這項特點。

「時窮節乃見」這句話，說明了危急情境才是真正考驗的時候。審配面臨城破之後即將被俘虜、或者已經被俘虜的下場，做出了他對命運的回應，《魏志·董二袁劉傳》：「配兄子榮守東門，夜開門內太祖兵，與配戰城中，生禽配。配聲氣壯烈，終無撓辭，見者莫不歎息。遂斬之。」（頁202）審配因不願投降而旋即遭來斬殺的結局，讓後世讀者不禁動容其始終「聲氣壯烈」、「終無撓辭」，實乃為一代烈士矣⁴³！范曄《後漢書·袁紹劉表列傳》（頁2416）亦基本採用了此類說法。袁曄卻收錄了審配逃跑、躲藏後被俘虜的史料，裴松之轉述：「樂資《山陽公載記》及袁曄《獻帝春秋》並云太祖兵入城，審配戰于門中，既敗，逃於井中，於井獲之。」（頁206）理論上《山陽公載記》、《獻帝春秋》之歷史敘述往往較諸以簡略聞名的《三國志》繁多、詳細，這裡或許是肇因於裴松之不願完整徵引之，才採用概括的方式帶過；接續即對樂資、袁曄之說法予以批判：

臣松之以為配一代之烈士，袁氏之死臣，豈當數窮之日，方逃身于井，此之難信，誠為易了。不知資、曄之徒竟為何人，未能識別然否，而輕弄翰墨，妄生異端，以行其書。如此之類，正足以誣罔視聽，疑誤後生矣。寔史籍之罪人，達學之所不取者也。（頁206）

⁴³ 《英雄記》有兩條史料亦突顯審配之氣節，應為陳壽參酌的史料。魏·王粲撰，清·黃奭輯，《英雄記》，收錄於俞紹初輯校，《建安七子集》，頁245-246。

「未能識別然否」、「輕弄翰墨」、「妄生異端」，這是對兩人臨史心態、著史才能方面非常嚴重的批判。再考量到兩部著作於傳播與接受之層面的影響力，恐怕還造成「誣罔視聽」、「疑誤後生」的問題，《裴注》之中很少看到裴松之如此憤怒。

裴松之措辭之強烈，實不亞於前文徵引其評論《獻帝春秋》記載荀彧「辭情頓屈」一事。應與荀彧、審配皆乃當世賢哲，袁曄卻引用了謬說、詆毀之辭以解構該定位的緣故。裴松之畢竟還閱讀過《先賢行狀》⁴⁴，當中的審配個傳將人物的骨氣襯顯得更具體，同傳注引：

配字正南，魏郡人，少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節。……初，譚之去，皆呼辛毗、郭圖家得出，而辛評家獨被收。及配兄子開城門內兵，時配在城東南角樓上，望見太祖兵入，忿辛、郭壞敗冀州，乃遣人馳詣鄴獄，指殺仲治家。是時，辛毗在軍，聞門開，馳走詣獄，欲解其兄家，兄家已死。是日生縛配，將詣帳下，辛毗等逆以馬鞭擊其頭，罵之曰：「奴，汝今日真死矣！」配顧曰：「狗輩，正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也！且汝今日能殺生我邪？」有頃，公引見，謂配：「知誰開卿城門？」配曰：「不知也。」曰：「自卿（文）〔子〕榮耳。」配曰：「小兒不足用乃至此！」公復謂曰：「曩日孤之行圍，何弩之多也？」配曰：「恨其少耳！」公曰：「卿忠于袁氏父子，亦自不得不爾也。」有意欲活之。配既無撓辭，而辛毗等號哭不已，乃殺之。初，冀州人張子謙先降，素與配不善，笑謂配曰：「正南，卿竟何如我？」配厲聲曰：「汝為降虜，審配為忠臣，雖死，豈若汝生邪！」臨行刑，叱持兵者令北向，曰：「我君在北。」（頁205-206）

⁴⁴ 盧弼：「《隋書·經籍志》：『《海內先賢傳》四卷，魏明帝時撰。』《舊唐書·經籍志》：『海內先賢傳四卷，魏明帝撰。《海內先賢行狀》三卷，李氏撰。』《唐書·藝文志》：『《海內先賢傳》五卷，魏明帝時撰。《李氏海內先賢行狀》三卷。』三志所載，不同如此。……未知裴注所引，究為何書也。」盧弼集解，錢劍夫整理，《三國志集解》，頁119。

將審配列入「先賢」之列，褒揚之意實不待言。透過審配與曹操之對話、透過審配自己的言語、透過曹操「有意欲活之」的心理描寫，還透過「忠臣」審配與「狗輩」辛毗（?-235?）、「降虜」張子謙的對比描寫等等。將審配剛毅忠貞之性格面貌表現得淋漓盡致。可以想像，裴松之在閱讀完《三國志》、《先賢行狀》後，對這位賢哲應當懷抱著崇拜之情，對樂資、袁曄兩位史家則是深感忿忿。

暫且撇開史學真實性的問題，審視《獻帝春秋》文學面向的表現。該條概述之史料雖然沒有留下對話內容，卻透過一個「逃於井中」的動作，型塑了主人公臨禍前膽小懦弱的性格，揭露了貪生怕死的自然人性：讓世人看到審配平時不為人知的一面。縱使「妄生異端」、「誣罔視聽」，對向來好奇求異的一般讀者來說信然頗具吸引力。然而，《獻帝春秋》本質是部史籍，史傳文學除了求美、還要兼顧求真，張高評云：「史學貴真，文學尚美，傳記文學既為史學文學之統一物，故須兼具真與美。」⁴⁵此言誠然。一般傳記文學既已如此，何況是定義更狹窄、求真標準更高的史傳文學⁴⁶。史家既然鬆懈了真實性的檢驗，也難免削弱了該書的價值。

（三）董卓與袁紹、皇甫嵩的互動記載

董卓，係屬漢末群雄之中最罪惡滔天者，《魏志·董二袁劉傳》「評曰」：「董卓狼戾賊忍，暴虐不仁，自書契已來，殆未之有也。」（頁216）范曄《後漢書·董卓列傳》「論曰」：

董卓初以虓闖為情，因遭崩剝之執，故得蹈藉彝倫，毀裂畿服。夫以剝肝斲趾之性，則群生不足以厭其快，然猶折意縉紳，遲疑

⁴⁵ 見氏，《左傳之文學價值》（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2），頁140。

⁴⁶ 劉國平：「『傳記文學』一名較具普遍性，範圍亦廣，『史傳文學』一名因限於『史傳』，故範圍既狹，歷史性亦相對增加。」「所謂史傳文學，就是可信度較高的歷史著作中，具有傳記性質或涉及人物刻劃，且文學性強的作品。」見氏，〈史傳文學之理論建構——史傳文學如何可能〉，《彰化師大國文學誌》第11期（2005.12），頁355、362。

陵奪，尚有盜竊之道焉。及殘寇乘之，倒山傾海，崑岡之火，自茲而焚，〈版〉、〈蕩〉之篇，於焉而極。嗚呼，人之生也難矣！天地之不仁甚矣！（頁2344）

范曄批判董卓的力量不亞於陳壽，只是議論的內容更繁多。還注意到了此大奸大惡者尚有「盜竊之道」，懂得「折意縉紳」、「遲疑陵奪」，即尊重士大夫與侵凌劫奪之時有些猶豫不決。

面對這樣暴虐不仁、卻還尚有「盜竊之道」者，如何進退應對也是一門藝術，尤其是對方拋出了棘手問題時。董卓曾經當面質詢袁紹關於廢帝一事，無疑正考驗著袁紹該如何回應。《魏志·董二袁劉傳》：「董卓呼紹，議欲廢帝，立陳留王。是時紹叔父隗為太傅，紹偽許之，曰：『此大事，出當與太傅議。』卓曰：『劉氏種不足復遺。』紹不應，橫刀長揖而去。」（頁190）注引《獻帝春秋》：

卓欲廢帝，謂紹曰：「皇帝沖闇，非萬乘之主。陳留王猶勝，今欲立之。人有少智，大或癡，亦知復何如，為當且爾；卿不見靈帝乎？念此令人憤毒！」紹曰：「漢家君天下四百許年，恩澤深渥，兆民戴之來久。今帝雖幼沖，未有不善宣聞天下，公欲廢適立庶，恐眾不從公議也。」卓謂紹曰：「豎子！天下事豈不決我？我今為之，誰敢不從？爾謂董卓刀為不利乎！」紹曰：「天下健者，豈唯董公？」引佩刀橫揖而出。（頁190）

《三國志》、《獻帝春秋》於歷史敘述大多是用對話完成，兩者之間卻有簡略／繁多之敘述風格的差異。另外，陳壽、袁曄的記載有同有異，主要差別之一在袁紹面對董卓詢問後的反應明顯具柔、剛之別。

陳壽筆下的袁紹在面對董卓廢帝的提議，採取了一個虛與委蛇的姿態；既不願當面跟董卓發生衝突，亦不願支持董卓如是亂臣賊子的決定，結果是「紹不應，橫刀長揖而去」。袁曄筆下的袁紹在面對如是棘手的議題時，不僅沒有假意周旋、甚至持正議反駁之，讓董卓當下大怒；結果是袁紹沒有屈服，發出了「天下健者，豈唯董公」的反擊話語後就離開現場。同傳裴松之自注發出了質疑：

臣松之以為紹於時與卓未構嫌隙，故卓與之諮謀。若但以言議不同，便罵為豎子，而有推刃之心，及紹復答，屈疆為甚，卓又安能容忍而不加害乎？且如紹此言，進非亮正，退違詭遜，而顯其競爽之旨，以觸哮闕之鋒，有志功業者，理豈然哉！此語，妄之甚矣。（頁190）

裴松之認為董卓的反應有違情理，不應於諮謀之時即因意見不同而辱罵對方、甚至起了「推刃之心」；更何況，袁紹復答之辭語甚是強硬，董卓又豈能容忍之。最後，裴松之認為袁紹畢竟是「有志於功業者」，不至於發出「天下健者，豈唯董公」一語以抵觸董卓的「哮闕之鋒」，未免意氣用事。

較諸裴松之對袁曄的責難，兩晉史家應頗為認同《獻帝春秋》的說法，例如晉人張璠《（後）漢紀》⁴⁷：「董卓謂袁紹曰：『劉氏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橫刀長揖徑出，懸節於上東門，而奔冀州。」⁴⁸基本融合陳壽、袁曄的兩類說法，而保存「天下健者，豈惟董公」一語。時代更晚的袁宏《後漢紀》，對該事的記載也有類同《三國志》、《獻帝春秋》之處而近乎後者，包含董卓辱罵「豎子」、袁紹回擊「天下健者，豈唯董公」⁴⁹，不以雙方措辭激烈為病。

⁴⁷ 《魏志·三少帝紀》注引裴松之曰：「張璠、虞溥、郭頒皆晉之令史，璠、頒出為官長，溥，鄱陽內史。」（頁133）裴松之將張璠與卒年於西晉的虞溥、後世認為是西晉人的郭頒並提，只不過其卒年應遲至東晉，《經典釋文·注解傳述人·周易》：「張璠《集解》十二卷。安定人，東晉秘書郎參著作。」唐·陸德明著，吳承仕疏證，秦青點校，《經典釋文序錄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44。

⁴⁸ 詳見周天游輯注，《八家後漢書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頁710。

⁴⁹ 「癸酉，卓謂司隸校尉袁紹曰：『人主宜立賢明，天下豈有常！每念靈帝，使人憤毒。今當立董侯，不知能勝史侯否？為當且爾，劉氏種不足復遺。』紹曰：『今上未有不善害於天下，若明公違禮任意廢嫡立庶，四海恐不從明公議也。』卓叱紹曰：『豎子！天下事豈不在我？我欲為之，誰敢不從！』紹橫刀長揖曰：『天下健者，豈唯董公！』既出，遂奔冀州。」晉·袁宏撰，李興和點校，《袁宏《後漢紀》集校》，頁319。

較諸前引陳壽、袁曄、袁宏等晚出的范曄，也於融合諸家說法⁵⁰的基礎上保留了董卓辱罵「豎子」、袁紹拒絕方式較激烈的部份⁵¹，不採用《裴注》之意見⁵²。或許是這些史家們的求善心理作祟，對袁紹直接跟董卓翻臉一事表達認同，以至於無法同裴松之一般仔細檢視其情理；抑或者，裴松之既然早已十分厭惡《獻帝春秋》而進一步有吹毛求疵之嫌。無論如何，透過人物之言語、透過人物於窘迫情境下的反應，《獻帝春秋》中的袁紹無疑十分深刻地表現了其方正直切、不畏強權的性格；雖難免有些暴虎馮河之感，整體看來應當還是屬於精彩地型塑了人物的史料。

另外，袁曄筆下的董卓相關事蹟還有一條史料值得一談，即董卓、皇甫嵩(?-195)兩人化解緊張關係一事。先行徵引范曄《後漢書·皇甫嵩朱雋列傳》：

嵩子堅壽與卓素善，自長安亡走洛陽，歸投於卓。卓方置酒歡會，堅壽直前質讓，責以大義，叩頭流涕。坐者感動，皆離席請之。卓乃起，牽與共坐。使免嵩囚，復拜嵩議郎，遷御史中丞。及卓還長安，公卿百官迎謁道次。卓風令御史中丞已下皆拜以屈嵩，既而抵手言曰：「義真備未乎？」嵩笑而謝之，卓乃解釋。（頁2307）

⁵⁰ 又例如《英雄記》：「董卓在顯陽苑，請官僚共議，欲有廢立，謂袁紹曰：『劉氏之種，不足復遺。』袁紹曰：『漢家君天下四百許年，恩澤深渥，兆民載之，恐眾不從公議。』卓曰：『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令為之，誰敢不從！』紹曰：『天下健者，不唯董公！紹請立觀之。』橫刀長揖而去，坐中皆驚愕。時卓新至，見紹大家，故不敢害之。」「董卓謂袁紹曰：『皇帝沖闇，非萬機之主。陳留王猶勝，今欲立之。』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橫刀長揖徑出，懸節於東門，而奔冀州。」魏·王粲撰，清·黃奭輯，《英雄記》，收錄於俞紹初輯校，《建安七子集》，頁222、242。

⁵¹ 《後漢書·袁紹劉表列傳》：「頃之，卓議欲廢立，謂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董侯似可，今當立之。』紹曰：『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下。若公違禮任情，廢嫡立庶，恐眾議未安。』卓案劔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為之，誰敢不從！』紹詭對曰：『此國之大事，請出與太傅議之。』卓復言『劉氏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橫刀長揖徑出。懸節於上東門，而奔冀州。」（頁2374）

⁵² 裴松之〈上三國志注表〉撰於元嘉六年（429），范曄從元嘉九年（432）才著手撰寫《後漢書》。

注引《獻帝春秋》：

初卓為前將軍，嵩為左將軍，俱征邊章、韓遂，爭雄。及嵩拜車下，卓曰：「可以服未？」嵩曰：「安知明公乃至於是？」卓曰：「鴻鵠固有遠志，但燕雀自不知耳。」嵩曰：「昔與明公俱為鴻鵠，但明公今日變為鳳皇耳。」（頁2307）

另外，《魏志·董卓傳》：「公卿見卓，謁拜車下，卓不為禮。召呼三臺尚書以下自詣卓府啟事。」（頁176）條下注引樂資《山陽公載記》⁵³、張璠《（後）漢紀》計兩則，樂資的說法大致同《獻帝春秋》（《裴注》較《李賢注》多了結尾而較首尾俱全：「卓笑曰：『卿早服，今日可不拜也。』」）也，也跟晚出的袁宏《後漢紀》相似⁵⁴，張璠則如下：

卓抵其手謂皇甫嵩曰：「義真怖未乎？」嵩對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慶方至，何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將天下皆懼，豈獨嵩乎？」卓默然，遂與嵩和解。（頁178-179）

除了陳壽簡略敘述、范曄記載雖長而筆下的皇甫嵩僅有「笑而謝之」的言行，其他諸書大致皆以董卓與皇甫嵩兩人對話為主體。其中，又以張璠之敘述迥異於諸家。至於袁宏、樂資筆下之歷史敘述基本類同《獻帝春秋》，范曄也沒有同張璠一般突顯了皇甫嵩之辭氣不饒。

就當時的狀況檢視，皇甫嵩實在沒有必要再冒險跟董卓言語交鋒。如同《獻帝春秋》之記載，已經足夠表現出皇甫嵩在面臨危急時，竟然有使用較輕鬆之言語以化解雙方一直以來緊張關係的急智。袁曄之著作固然頗多謬誤，也未必每一條史料都不近情理。

⁵³ 「初卓為前將軍，皇甫嵩為左將軍，俱征韓遂，各不相下。後卓徵為少府并州牧，兵當屬嵩，卓大怒。及為太師，嵩為御史中丞，拜於車下。卓問嵩：『義真服未乎？』嵩曰：『安知明公乃至於是！』卓曰：『鴻鵠固有遠志，但燕雀自不知耳。』嵩曰：『昔與明公俱為鴻鵠，不意今日變為鳳皇耳。』卓笑曰：『卿早服，今日可不拜也。』」（頁178）

⁵⁴ 「卓將至，公卿以下迎之，皆謁拜〔車〕下，卓不為禮。卓謂御史中丞皇甫嵩曰：『可以服否？』嵩曰：『安知明公乃至於是。』卓曰：『鴻鵠固有遠志，但燕雀自不知爾。』嵩曰：『昔與公俱為鴻鵠，但今日復變為鳳皇爾。』卓乃大笑曰：『卿早服，可得不拜。』」晉·袁宏撰，李興和點校，《袁宏《後漢紀》集校》，頁328。

(四) 曹操陣營與呂布陣營之互動的記載

前文所舉之例中，已經有兩例涉及了曹魏實際開國君王曹操的相關事蹟。大抵此人為漢末時期表現得最傑出的軍閥，開創了後來曹魏王朝的江山，倘若特別吸引後代史家、讀者關注，自然不足為奇。以下還有曹操、呂布陣營之互動的記載三例，曹操或以主角現身、或以配角現身。

首例先見曹操險些死於戰場一事，《魏志·武帝紀》：「布出兵戰，先以騎犯青州兵。青州兵奔，太祖陳亂，馳突火出，墜馬，燒左手掌。司馬樓異扶太祖上馬，遂引去。」（頁11）主要是記載了一次曹操敗於呂布（?-199）之手的戰役，過程甚至墜馬、燒傷左手掌。同傳注引《獻帝春秋》：

太祖圍濮陽，濮陽大姓田氏為反間，太祖得入城。燒其東門，示無反意。及戰，軍敗。布騎得太祖而不知是，問曰：「曹操何在？」太祖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太祖而追黃馬者。門火猶盛，太祖突火而出。（頁12）

《獻帝春秋》的記載有些不同，敘述曹操逃跑的過程更是具戲劇性，亦具有補史之功⁵⁵。曹操軍敗被擄，幸而沒有被敵方騎兵認出；值得讓人讚嘆處，在於曹操面對「曹操何在」的質疑，當下竟然沒有慌張、不知所措，反而僅用一句「乘黃馬走者是也」來解圍。面對生死一線間當下的反應，其急智、狡慧表露無遺。

接下來兩例則是對呂布一方來說身處危急情境，首例詳見《魏志·呂布臧洪傳》：「太祖自征布，至其城下，遺布書，為陳禍福。布欲降，陳宮等自以負罪深，沮其計。」（頁226）《獻帝春秋》：

太祖軍至彭城。陳宮謂布：「宜逆擊之，以逸擊勞，無不克也。」布曰：「不如待其來攻，蹙著泗水中。」及太祖軍攻之急，布于白門樓上謂軍士曰：「卿曹無相困，我（自首當）〔當自首〕明

⁵⁵ 盧弼注引沈家本：「陣中何自有火，此語未明。注引袁曄言燒東門，足補史文之缺。」盧弼集解，錢劍夫整理，《三國志集解》，頁52。

公。」陳宮曰：「逆賊曹操，何等明公！今日降之，若卵投石，豈可得全也！」（頁227）

陳壽、袁曄對於陳宮的心理狀態之記載有所差異，陳壽強調陳宮是因為「自以負罪深」才不願投降，袁曄則是藉陳宮之口強調「逆賊曹操」、「豈可得全」。《獻帝春秋》之說法本身沒有破綻，只是范曄於《後漢書·劉焉袁術呂布列傳》（頁2450）依然採用了《三國志》的說法。《獻帝春秋》書寫了一個相當急迫的環境：敵方「軍攻之急」。主帥呂布替自己的軍士著想，抑或是為了自己先前的誤判負責而決定自首；刻劃了呂布實有替部屬們著想、勇於承擔的一面，背後也有些人性的溫暖。理論上，主帥既然已經做出了決定，似乎戰爭可以就此拉下帷幕。這個時候故事情節突然轉折，陳宮表現出剛正嚴肅的臉孔、形成了呂布的對照組，不僅痛罵曹操是「逆賊」，還強調呂布投降是「若卵投石」。

類似故事情節突然發生轉折的情況，另一例中也有出現。《魏志·呂布臧洪傳》：

布與其麾下登白門樓。兵圍急，乃下降。遂生縛布，布曰：「縛太急，小緩之。」太祖曰：「縛虎不得不急也。」布請曰：「明公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天下不足憂。明公將步，令布將騎，則天下不足定也。」太祖有疑色。劉備進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及董太師乎！」太祖領之。布因指備曰：「是兒最叵信者。」（頁227）

注引《獻帝春秋》：

布問太祖：「明公何瘦？」太祖曰：「君何以識孤？」布曰：「昔在洛，會溫氏園。」太祖曰：「然。孤忘之矣。所以瘦，恨不早相得故也。」布曰：「齊桓舍射鉤，使管仲相；今使布竭股肱之力，為公前驅，可乎？」布縛急，謂劉備曰：「玄德，卿為坐客，我為執虜，不能一言以相寬乎？」太祖笑曰：「何不相語，而訴明使君乎？」意欲活之，命使寬縛。主簿王必趨進曰：「布，勅虜也。其眾近在外，不可寬也。」太祖曰：「本欲相緩，主簿復不聽，如之何？」（頁228）

不論是《三國志》所載⁵⁶、抑或是《獻帝春秋》所載，呂布被俘虜後的反應實可見其尚有能言善道的急智、理性地陳述自己存在價值的政治觀察力。角色之間的對話內容也都相當精采。呂布雖是以一介驍勇的武將聞名當世，卻依然可見其性格中較具思考性、柔軟性之處，曹操甚至於一度被其規劃的未來藍圖打動。惜哉，第三人出面勸阻了曹操，同時破壞了呂布求生的希望。《獻帝春秋》的記載本身亦沒有破綻，只是范曄在《後漢書·劉焉袁術呂布列傳》（頁2451）依然採用《三國志》的說法。

《獻帝春秋》還有其他類似的案例。例如劉備阻止孫權進攻蜀地一事⁵⁷、孫策責讓王朗（?-228）一事⁵⁸、曹操面見漢獻帝一事⁵⁹，都可以

⁵⁶ 又見《英雄記》：「曹公擒呂布，布顧謂劉備曰：『玄德，卿為座上客，我為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邪？』操曰：『縛虎不得不急。』曹公欲緩之，備曰：『不可！公不見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憾之。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魏·王粲撰，清·黃奭輯，《英雄記》，收錄於俞紹初輯校，《建安七子集》，頁232。

⁵⁷ 《蜀志·先主傳》注引《獻帝春秋》：「孫權欲與備共取蜀，遣使報備曰：『……』備欲自圖蜀，拒答不聽，曰：『……今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借樞於操，使敵承其隙，非長計也。』權不聽，遣孫瑜率水軍住夏口。備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諸葛亮據南郡，備自住孱陵。權知備意，因召瑜還。」（頁880）

⁵⁸ 《魏志·鍾繇華歆王朗傳》注引《獻帝春秋》：「孫策率軍如閩、越討朗。朗泛舟浮海，欲走交州，為兵所逼，遂詣軍降。策令使者詰朗曰：『……』朗稱禽虜，對使者曰：『朗以瑣才，誤竊朝私，受爵不讓，以違罪網。前見征討，畏死苟免。……』」（頁407）

⁵⁹ 《獻帝春秋》：「獻帝都許。守位而已。宿衛近侍。莫非曹氏黨舊恩戚。議郎趙彥嘗為帝陳言時策。曹操惡而殺之。其餘內外多見誅。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忿。因曰君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俛仰求出。舊儀三公輔兵入朝。令虎賁執刃挾之。操顧左右。汗流浹背。自後不敢復朝請。」_____，《中國野史集成》（成都：巴蜀書社，1993，影印古今說部叢書），第1冊，頁224。這條史料目前不見其他古籍徵引，這裡雖然引用但暫且存疑。范曄《後漢書·皇后紀》（頁453）記載大致如《獻帝春秋》，《漢晉春秋》亦基本如此，詳見清·湯球、黃奭輯，喬治忠校注，《眾家編年體晉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頁14。最早的出處應該是現存於《御覽》卷三八七的《獻帝傳》：「舊儀三公領兵見，令虎賁執刃扶之，曹操顧左右汗流背，自後不敢復朝請。」宋·李昉編纂，夏劍欽校點，《太平御覽》（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見及劉備、王朗、曹操面臨急迫難題下的反應。表現諸位人物、角色之性格側面，包括劉備處理軍政時頗為果斷強硬、王朗被俘虜後求饒的姿態、曹操面對年輕的漢獻帝發怒時竟也難免於恐懼等，不再一一闡釋。《獻帝春秋》的一些史料，其他正史或直接使用之、或者徵引了類似的記載，包括《三國志》、袁宏《後漢紀》、范曄《後漢書》等這些歷來較受肯定的史籍，這些地方往往是陳壽、袁宏、范曄等史家筆下文學色彩最濃厚之處。正史通常對於歷史真實性有著更高的標準，《獻帝春秋》非屬該類著作，而從一開始即鬆懈了這方面的要求，這也使得該書有著更寬廣的空間收集同一類型具有濃厚文學性的「傳聞異詞」。

四、史家之著述立場

史家通常有其各自不同的關懷，產生了各式各樣的歷史詮釋，給予了後世一扇扇探索過去的窗口，誠如王汎森論道：「時代的關懷、史家個人的價值判斷，可能幫助人們照見過去不為人重視的歷史陰暗角落。」⁶⁰以下即將前文尚未徵引的諸條史料一一列出，藉此再觀察袁曄對東漢末期、「前三國時期」之群雄們的書寫實況還有何值得闡釋的地方。這些群雄除了曹操算是後世認定的王朝之「創業之主」，其餘漢末群雄大多是對紀傳體三國史的列傳編排原則來說係屬於「開國群雄傳」者，這類人物之個傳通常是置諸在帝王本紀之後⁶¹。

以下即分項收拾全文：

第4冊，頁236-237。後來郭頒《魏晉世語》亦採之：「舊制，三公領兵入見，皆交戟又顛而前。初，公將討張繡，入覲天子，時始復此制。公自此不復朝見。」（《魏志·武帝紀》注引，頁15）

⁶⁰ 見氏，〈時代關懷與歷史解釋〉，《古今論衡》第23期（2011.12），頁9。

⁶¹ 徐沖：「書寫對象是與王朝『創業之主』之間不存在原初性君臣關係的前代王朝之末世群雄；其在紀傳體王朝史中的位置則通常被置于本紀之後、諸臣傳之前。」見氏，〈「開國群雄傳」小考〉，《中國中古史研究》編委會編，《中國中古史研究·第一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80。

（一）創業君王之一：曹操的人物形象

整體來說，不利於曹操的史料稍多些、利於曹操的史料較少些。雖不乏一些看似較正面型塑的史料，例如曹操被呂布騎兵俘虜後急中生智一事，只是被俘虜終究不見得光彩。比較確定具有正面型塑效果的史料，則見《魏志·武帝紀》：「（曹操）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頁18）注引《獻帝春秋》：「（劉）備謂岱等曰：『使汝百人來，其無如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耳！』」（頁18）算是十分肯定曹操的領軍作戰能力。

以下盤點不利於曹操的史料，先行徵引其整肅楊彪（142-225）一事，歷史背景詳見范曄《後漢書·楊震列傳》：

時天子新遷，大會公卿，兗州刺史曹操上殿，見彪色不悅，恐於此圖之，未得讎設，託疾如廁，因出還營。彪以疾罷。時袁術僭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頁1788）

注引《獻帝春秋》：「〔融見〕操〔曰〕：『刑之不濫，君之明也。楊彪獲罪，懼者甚眾。』」（頁1788）史注家大抵僅摘錄下該書對《後漢書》之孔融（153-208）話語具有補充價值的部份。還有，范曄《後漢書·袁紹劉表列傳》：「操因睚眦，被以非罪，箠楚并兼，五毒俱至」（頁2396）注引《獻帝春秋》：「收彪下獄考實，遂以策罷。」（頁2397）史家原本對該事的記載原本或許是相當完整的，可惜《李賢注》未能「首尾完具」地保存下來。

檢視《獻帝春秋》所載，荀彧之死的謬說、楊彪入獄的事件，都可以見及曹操的不臣之心、剷除異己的企圖，前者的史料中甚至有攻擊曹操為「老賊不死，禍亂未已」的話語。甚至於前引陳宮曾對呂布言及「逆賊曹操」一語，也不妨可視為對曹操本人的貶抑。又，范曄《後漢書·袁紹劉表列傳》收錄袁紹的討曹檄文：

往歲伐鼓北征，討公孫瓚，強禦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欲託助王師，以見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屯據敖倉，阻河為固……（頁2397）

注引《獻帝春秋》：「操引軍造河，託言助紹，實圖襲鄴，以為瓚援。會瓚破滅，紹亦覺之，以軍退，屯于敖倉。」（頁2398）袁曄採用了曹操原本試圖偷襲的說法，顯係信服了親近袁紹一方的歷史論述。

另外還有兩條史料值得徵引，整體較中性些，《魏志·武帝紀》：「三年春正月，公還許，初置軍師祭酒。三月，公圍張繡於穰。夏五月，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頁15）注引《獻帝春秋》：「袁紹叛卒詣公云：『田豐使紹早襲許，若挾天子以令諸侯，四海可指麾而定。』」公乃解繡圍。」（頁16）以及《魏志·董二袁劉傳》注引《獻帝春秋》：「紹恥班在太祖下，怒曰：『曹操當死數矣，我輒救存之，今乃背恩，挾天子以令我乎！』太祖聞，而以大將軍讓于紹。」（頁195）一面表現曹操之謙讓，不失為正面型塑；另一面則寫袁紹怒罵曹操「曹操當死數矣，我輒救存之」，則屬於貶抑曹操的論述。

不同於《山陽公載記》較不涉及曹操，不同於《獻帝起居注》、《獻帝傳》之作者生活在曹氏統治下而較受限制。《獻帝春秋》這部吳人史籍，收錄了不少對曹操較不利的史料、甚至包含著僅此一家之言。如是，自有其獨特的史料價值。衡諸三國時期的著述實況，此或非吳人之專利；卻也不免讓人想起同屬吳人之著作而詆毀痕跡非常顯著的《曹瞞傳》⁶²，以及後文即將提及的謝承《後漢書》。背後自有其政治意識型態之作用，或者是屬於吳人共享的話語網絡。

⁶² 《曹瞞傳》輯佚，詳見朱東潤，《八代傳敘文學述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頁197-202。

(二) 末世群雄之一：袁紹的人物形象

政權之分裂，導致各方的史家不免於奠基於各自的立場貶抑敵方英雄人物，反過來也給予了後人一個個不同的視野認識歷史人物的途徑。同時，今人透過細部觀察每一本史籍的歷史敘述，亦可從中窺見史家對特定歷史事件、特定歷史人物獨特的詮釋、認知與想像⁶³。

《三國志》「開國群雄傳」中出現的人物，於《獻帝春秋》裡被收錄次數最多者應當是袁紹，同時就是曹操統一中原之前實力最強的軍閥。《獻帝春秋》同時事涉曹操、袁紹的史料並不少。例如前文徵引袁紹指責曹操「背恩」一事，曹操「託言助紹」而「實圖襲鄴」一事皆為案例。另外還有一例，范曄《後漢書·袁紹劉表列傳》：「紹為高檣，起土山，射營中，〔營中〕皆蒙楯而行。」（頁2400）注引《獻帝春秋》：「紹令軍中各持三尺繩，曹操誠禽，但當縛之。」（頁2400）就僅僅是戰爭過程的細節而已，較無足論道。

其他事涉袁紹的相關史料還相當多⁶⁴，有幾條明顯屬於對其來說是具加分作用的史料，類似之前徵引袁紹、董卓衝突一事的型塑效果。范

⁶³ 畢竟「過去」已經是「過去」，嚴格來說所有史籍中的內容都僅是史家個人的論述而已。不應僅局促在是非、真偽的史料問題，還應當思考史家究竟認為「怎樣」的歷史敘述，方才符合其推測的歷史真實 (historical reality)。詹京斯 (Keith Jenkins)：「作為論述的歷史與其論述的對象並不屬於同一範疇，也就是說『過去』和『歷史』是不同的事。再者，『過去』和『歷史』彼此之間的綴連程度，並沒有大到只能有一種對『過去』的解讀是絕對必然的。……讓我由『歷史乃論述過去，但絕不等於過去』的這個想法談起。」英·凱斯·詹京斯著，賈士蘅譯，《歷史的再思考》（臺北：麥田出版社，2006），頁 84-85。

⁶⁴ 《三國志·蜀書·先主傳》：「先主遂領徐州。」（頁 873）注引《獻帝春秋》：「陳登等遣使詣袁紹曰：『天降災沴，禍臻鄙州，州將殂殞，生民無主，恐懼英雄一旦承隙，以貽盟主日昃之憂，輒共奉故平原相劉備府君以為宗主，永使百姓知有依歸。……』紹答曰：『劉玄德弘雅有信義，今徐州樂戴之，誠副所望也。』」（頁 874）以及《後漢書·虞傅盖臧列傳》：「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使洪邑人陳琳以書譬（臧）洪，示其禍福，責以恩義。」（頁 1887）注引《獻帝春秋》：「『紹使琳為書八條，責以恩

曄《後漢書·袁紹劉表列傳》：「紹上書曰：『……故遂引會英雄，興師百萬，飲馬孟津，歃血漳河。』」（頁2385）注引《獻帝春秋》：

紹合冀州十郡守相，眾數十萬，登壇歃血，盟曰：「賊臣董卓，承漢室之微，負兵甲之眾，陵越帝城，跨蹈王朝……凡我同盟之後，畢力致命，以伐凶醜，同獎王室，翼戴天子。有渝此盟，神明是殛，俾墜其師，無克祚國！」（頁2385）

記錄下袁紹合冀州十郡之力，以及討伐董卓時登壇歃血的長篇盟詞。其次，《獻帝春秋》：「袁紹將兵入宮，誅諸黃門。張讓等逼迫，以尺一詔開大夏門，將帝及陳留王出，不知所如。有螢火照道，到盟津河上……」⁶⁵記載袁紹誅殺禍國殃民的宦官們一事。再其次，例如范曄《後漢書·袁紹劉表列傳》：「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干壽等數萬人共覆鄴城，殺郡守。坐中客家在鄴者，皆憂怖失色，或起而啼泣，紹容貌自若，不改常度。」（頁2381）注引《獻帝春秋》：「紹勸督引滿投壺，言笑容貌自若。」（頁2382）此次史料亦見諸《魏志·董二袁傳》注引《英雄記》（頁194），皆呈現袁紹面對危急時之鎮定從容的神情意態。最後再如范曄《後漢書·袁紹劉表列傳》：「冀州城邑多畔，紹復擊定之。自軍敗後發病，七年夏，薨。」（頁2403）注引《獻帝春秋》：「紹為人政寬，百姓德之。河北士女莫不傷怨，市巷揮淚，如或喪親。」（頁2403）反映其深得河北百姓民心的狀況。

考量到正史著作、北方歷史詮釋系統中對這些軍閥的書寫，大抵以曹魏官方史籍王沈（?-266）《魏書》為代表，此時袁紹就僅被視為一般

義，告諭使降』也。」（頁1887）《後漢書·劉虞公孫瓚陶謙列傳》：「未及至，瓚乃密使行人齎書告續曰：『……』紹候得其書」（頁2364）注引《獻帝春秋》：「『候者得書，紹使陳琳易其詞』，即此書。」（頁2365）《後漢書·袁紹劉表列傳》：「主簿耿包密白紹曰：『赤德衰盡，袁為黃胤，宜順天意，以從民心。』」（頁2390）注引《獻帝春秋》：「袁，舜後。黃應代赤，故包有此言。』」（頁2391）

⁶⁵ 《御覽》卷九十二引。宋·李昉編纂，夏劍欽校點，《太平御覽》，第1冊，頁809。

軍閥、乃甚至於亂臣賊子⁶⁶。之後，《三國志》一書廣為世人樂道，同時影響了袁宏《後漢紀》、范曄《後漢書》等對漢末史的理解；但是，陳壽亦無需特意褒揚袁紹，反倒該書之《魏志》的部份明顯有些「尊魏」色彩。類似袁曄這樣頗多突顯袁紹個人正面形象之史籍，反而相當少見。另一位亦有著褒袁、貶曹跡象的吳人史家，則詳見謝承《後漢書》三條史料：「袁紹以曹操為東郡太守，劉公山為兗州。公山為黃巾所殺，乃以操為兗州刺史。」「操得兗州，兵眾強盛，內懷反紹意。」「操圍呂布於濮陽，為布所破，投紹。紹哀之，乃給兵五千人，還取兗州。」⁶⁷大抵呈現曹操「背恩」、袁紹施恩，且認為曹操原本屬於袁紹手下；這恐怕與曹、袁本屬對等之軍閥的事實有所差異⁶⁸，卻與《獻帝春秋》對曹、袁兩人的態度有些相呼應之處。「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或許這就是其對袁紹較具好感的原因之一。

⁶⁶ 王沈收錄袁紹的負面事蹟不少，自然左右北方論史的風向。例如《魏志·董二袁劉傳》注引《魏書》即彰顯袁紹之野心：「術歸帝號于紹曰：『……今君擁有四州，民戶百萬，以彊則無與比大，論德則無與比高。曹操欲扶衰拯弱，安能續絕命救已滅乎？』紹陰然之。」（頁 210）另外，《魏志·崔毛徐何邢鮑司馬傳》注引《魏書》褒曹、抑袁：「……時紹眾最盛，豪傑多向之。信獨謂太祖曰：『……』遂深自結納，太祖亦親異焉。汴水之敗，信被瘡，韜在陳戰亡。紹劫奪韓馥位，遂據冀州。信言於太祖曰：『奸臣乘釁，蕩覆王室，英雄奮節，天下嚮應者，義也。今紹為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若抑之，則力不能制，祇以遭難，又何能濟？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太祖善之。……」（頁 384）《魏書》竟然還藉袁紹之凶狠，表現了曹操維護自身政敵孔融、楊彪的事蹟；情理上不至於不可能，但更該思考的是何以要收錄、何以要如此書寫，恐怕不僅只是記錄歷史真相而已，《魏志·武帝紀》注引《魏書》：「袁紹宿與故太尉楊彪、大長秋梁紹、少府孔融有隙，欲使公以他過誅之。公曰：『……』紹以為公外託公義，內實離異，深懷怨望。」（頁 16-17）注引裴松之曰：「臣松之以為楊彪亦曾為魏武所困，幾至于死，孔融竟不免于誅滅，豈所謂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哉！非知之難，其在行之，信矣。」（頁 17）魏晉史家如何想像袁紹也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議題，容或他文處理。

⁶⁷ 《文選》卷 44〈為袁紹檄豫州〉李善（630-689）注。梁·蕭統主編，唐·李善注，《文選（附考異）》（臺北：五南圖書，2009），頁 1104-1105。

⁶⁸ 細部分析可參酌陳俊偉，《敘述觀點與歷史建構：兩晉史家的「三國」前期想像》（臺北：秀威經典，2015（原花蓮：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學位論文，102.3，舊題《兩晉史家之敘述觀點與三國前期歷史建構》），頁 202。

五、結語

吳人袁曄《獻帝春秋》一書，《隋書·經籍志》將之列入「古史」類，實則該書從內容上亦適宜與《獻帝紀（傳）》、《山陽公載記》同樣列入「雜史」類，屬於「愍其廢絕，各記聞見」的著作。裴松之注《三國志》徵引約29條，李賢注《後漢書》徵引約33條，魏晉時期其他相關史籍亦有參酌該書記載的跡象。而且，誠如盧弼觀察《資治通鑑》擇史情況後的歸納云：「袁氏書雖不經，頗資異聞，《通鑑》亦採之。」⁶⁹可想見其書從撰成之後一直因其「頗資異聞」而具有相當的影響力。

內容方面，史家好奇求異的臨史心態屢屢嶄露。頗多史料的真實性常常被懷疑，從《裴注》開始即屢次指責之，直至近代的盧弼亦稱該書為「不經」。看似率爾而作的現象背後，頗有值得後世讀者玩味之處。多條史料本身相當具文學性，有些雖然是謬誤的，但也不乏有些說法被其他史家認同的案例。藝術技巧的運用處，主要透過對話為首的諸項史傳之寫人技巧，讓人物易於活靈活現；以及，袁曄還尤擅、尤愛於一些將角色置諸於危急、需做出選擇的情境之史料，藉其面對難題時之反應以表現人物的性格側面，型塑人物各自的面貌。可惜從求真、求美兼具的史傳文學之視野檢視，未遑顧及真實性的下場，折扣了該書於此之成就。

另外，《獻帝春秋》之歷史敘述也反映了史家個人於撰史時有意識、或無意識間抱持的著述立場。該書不僅對敵國之實際開國君王曹操較不友善，還對曹操之重要敵人袁紹予以較正面的型塑，從中折射了三國鼎峙之爭霸實況、政治意識型態作用於史籍的影響。《獻帝春秋》中對曹操的態度，實又與《曹瞞傳》、謝承《後漢書》等吳人史籍相呼應，對袁紹的態度又與謝承《後漢書》相呼應，背後似乎有共享之話語網絡。

⁶⁹ 盧弼集解，錢劍夫整理，《三國志集解》，頁53。

從而也給予了後人一個不同之視野認識歷史人物的途徑，拓展了後世解讀三國史的空間。

藉由重新審視《獻帝春秋》的文學成就、史料價值、歷史想像，吾人實可以重新勾抉出該書之歷史敘述的諸項特色，從而再確認其存在的獨特價值。

主要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 〔西漢〕司馬遷撰，劉〔宋〕裴駙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
- 〔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2007。
- 〔晉〕袁宏撰，李興和點校，《袁宏《後漢紀》集校》，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2008。
- 〔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
- 〔梁〕蕭統主編，〔唐〕李善注，《文選（附考異）》，臺北：五南圖書，2009。
- 〔唐〕陸德明著，吳承仕疏證，秦青點校，《經典釋文序錄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84。
- 〔唐〕魏徵等撰，《隋書》，臺北：鼎文書局，1980。
- 〔唐〕劉知幾著，〔清〕浦起龍通釋，王煦華整理，《史通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 〔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
- 〔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
- 〔宋〕李昉編纂，夏劍欽校點，《太平御覽》，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 〔清〕紀昀等纂，《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
- 〔清〕姚振宗撰，《三國藝文志》，二十五史刊行委員會編，《二十五史補編》，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59。
- 〔清〕侯康撰，《補三國藝文志》，二十五史刊行委員會編，《二十五史補編》，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59。

- 〔清〕趙一清等撰，《三國志注補：外四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中國野史集成》，成都：巴蜀書社，1993，影印古今說部叢書。
- 李澄宇撰，《讀二十五史蠡述·讀三國志蠡述》，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
- 周天游輯注，《八家後漢書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喬治忠校注，《眾家編年體晉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
- 盧弼集解，錢劍夫整理，《三國志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二、近人論著

（一）專書

- 〔英〕凱斯·詹克斯著，賈士蘅譯，《歷史的再思考》，臺北：麥田出版社，2006。
- 于濤，《三國前傳：漢末群雄天子夢》，北京：中華書局，2006。
- 朱東潤，《八代傳敘文學述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
- 俞紹初輯校，《建安七子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7）。
- 馬鐵浩，《《史通》引書考》，北京：學苑出版社，2011。
- 遼耀東，《魏晉史學的思想與社會基礎》，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0。
- 張高評，《左傳之文學價值》，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2。
- 張新科，《唐前史傳文學研究》，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00。
- 陳俊偉，《敘述觀點與歷史建構：兩晉史家的「三國」前期想像》，臺北：秀威經典，2015。
- 雷家驥，《中古史學觀念史》，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0。
- 熊明，《漢魏六朝雜傳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4。

（二）期刊論文

〔日〕松本幸男，〈續張勃吳錄考（附吳錄紀傳）〉，《學林》第十六期（1991），頁54-86。

王文進，〈論「赤壁意象」的形成與流轉——「國事」、「史事」、「心事」、「故事」的四重奏〉，《成大中文學報》第二十八期（2010.4），頁83-124。

王永平，〈論荀彧——兼論曹操與東漢大族的關係〉，《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三期（1997），頁56-61。

王汎森，〈時代關懷與歷史解釋〉，《古今論衡》第二十三期（2011.12），頁3-18。

李伯勛，〈審視《三國志》裴注引書的史傳文學價值〉，《黃河科技大學學報》第二卷第二期（2000.6），頁83-89。

徐冲，〈「開國群雄傳」小考〉，收錄於《中國中古史研究》編委會編，《中國中古史研究·第一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81-105。

崔曙庭，〈三國志評介〉，收錄於倉修良主編，《中國史學名著評介（第一卷）》，臺北：里仁書局，1994，頁221-246。

董廣偉，〈從文史分野淺議裴松之《三國志注》〉，《洛陽理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二十三卷第二期（2008.10），頁1-4。

劉國平，〈史傳文學之理論建構——史傳文學如何可能〉，《彰化師大國文學誌》第十一期（2005.12），頁353-380。

（三）學位論文

宋志英，《晉代史學研究》（南開大學史學理論及史學史博士學位論文，2002.6）。

林盈翔，《裴松之與劉孝標史注學比較研究》（花蓮：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0.7）。

Selected Bibliography

- [Jin Dynasty] Chen Shou, [Sung Dynasty] Pei Sung-Zhi. “San Gou Zhi” Beijing: Zhong Hua, 2007.
- [Liu Song Dynasty] Fan Yie, [Tang Dynasty] Li Xian. “Hou Han Shu” Taipei: Ding Wen, 1981.
- [Tang Dynasty] Wei Zheng. “Sui Shu” Taipei: Ding Wen, 1980.
- Lu Yiou-Dung. “Wei Jin Shi Xue De Si Xing Yu She Hui Ji Chu” Taipei: Dung Da, 2000.
- Zhang Xin-Ke. “Tang Qian Shi Zhuan Wen Xue Yian Jiu” Xian: Xi-Pei University, 2000.
- Chen Jun-Wei. “Xu Shu Guan Dian Yu Li Shi Jian Gou: Liang Jin Shi Jia De ‘San Gou’ Qian Qi Xiang Xiang” Taipei: Xiu Wei, 2015.
- Xung Ming. Han Wei Liu Chao Za Zhuang Yian Jiu. Beijing: Zhong Hua, 2014.

On Historical Narratives of *Yuan Ye's Annals of Emperor Xian of Han*

Jun-Wei Chen*

Abstract

Annals of Emperor Xian of Han was authored by a Wu people Yuan Ye, and was classified as “ancient history” in *Bibliography of The Book of Sui*. It has been widely criticized for its fatal fallacies by scholars ever since Pei Songzhi did. Despite its willful writing and narratives far beyond the strict standard of historical truth, it’s worth readers while excavating deeper into its inner motifs of history: the tendency of exceeding self-originating; suggesting political stances intentionally or otherwise. The historical data themselves reveal the abundance of literariness by applying biographical narrative techniques, such as depicting people through amount of dialogues; and to profile individuals’ characters, it puts people in urgent situations repeatedly, and records their reactions. In addition, the text is rather hostile to Cao Cao, the practical founding lord of states. Moreover, it depicts Cao’s major opponent, Yuan Shao, in positive perspectives, which is marginal comparing to the dominating historical viewpoints of Wei, Jin. It does not merely reflect the fact that conflicts between *Three Kingdoms* did affect contemporary narratives, also does it bring up an argument that although the perspectives in the text are way different from others, and might be confined to one’s horizon and affiliation, however, these kinds of historical works elaborate and mark the spirit of “pity for those defeated” and “recording for reminding”. Above all, it’s not to figure out then that *Annals of Emperor Xian of Han* is certainly valuable in both historical and literal field.

Key Word: Warlords in *Late Han Dynasty*, Narratives of Characters, Historical-Biographical Literature, Unofficial History, *Annals of Emperor Xian of Han*

*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